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ZHONGGUOXIANDAI SHIXUEJIA  
XUESHUIJINGDIANWENKU

# 朱大渭

## 学术经典文集

ZHUDAWEIXUESHUIJINGDIANWENJI

■ 朱大渭 著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ZHONGGUOXIANDASHIXUEJIA  
XUESHUIJINGDIANWENKU

# 朱大渭

## 学术经典文集

ZHUDAWEIXUESHUIJINGDIANWENJI

■ 朱大渭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大渭学术经典文集 / 朱大渭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 3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203 - 08080 - 0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中国历史 - 魏晋南北朝时代 - 文集 IV. ① K 235. 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5401 号

## 朱大渭学术经典文集

---

著 者: 朱大渭

责任编辑: 樊 中

助理编辑: 何赵云

装帧设计: 柏学玲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 sxskcb. com

---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5. 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4 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8080 - 0

定 价: 30. 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 出版前言

自梁启超先生推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后，又一个百年过去了。这一个百年里，中国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同时学术腐败大量产生、学术垃圾层出不穷，给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需要及时地盘点、甄选、梳理和整合。这对于我国学术成果的总结和传承，对青年学者的学习和研究，对促进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与交流都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总结中国现代百年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传承史学大家的学术经典，促进史学研究的科学发展，山西人民出版社决定与全国史学界广泛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建设一项具有传世之功的学术公益工程。我们坚信，这是一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出版工程，将会师范后学，推动我国历史科学的进步。

学术论文是学者发表学科研究成果的一种基本方式，最能代表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思想，反映一个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境界。该文库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学术精华的大盘点、大集成和大展示，我们将在全国史学界的支持和帮助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陆续收录 1912 年以来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著名史学家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不收录学术著作），结集成书，铸造百年史学经典，希冀惠及当今，传之久远。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使用，我们在每个史学家的学术经典文集的前面设有学者学术小传，书后附有学者著述目录。同时，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网站上设有《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数据库，读者可凭借每册图书中书签所提供的密码，登录网站，使用其电子版。

我们在以往的出版工作中，曾得益于历史学界的信任、支持和帮助，谨此致敬、致谢！今后我们将不懈努力，继续为史学领域的学者和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山西人民出版社

## 作者学术小传

我于1931年2月出生在四川西充县。自幼喜欢读历史演义小说，逐渐对祖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因而在1953年报考四川大学历史系，立志要研究历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任历史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1986年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1988年被聘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1989年被中国军事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1991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特殊贡献专家特殊津贴”。1992年被聘为本院高级职称评委。同年两届被选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现任名誉会长。2006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在川大学习时，对我影响较深的首推尊敬的徐中舒、蒙文通、缪钺三位老师。三位老师在学术上，或考论双精，或博学贯通、或文史兼善。他们各展所长，传道授业，诲人不倦。蒙师傅通经学、玄学、理学、史学、宗教、古地理、古

民族诸多学科，而且能将各学科纵横联系、融会贯通，以其睿智的史识提出系统独到的见解。他曾多次畅谈中国历史发展至魏晋发生第二次大变化，并旁及陈寅恪隋唐制度“三源”说；章太炎“真以哲学著见者，当自曹魏始”；汤用彤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发生一大变”；刘师培“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南朝刘宋始”等高论。我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念头，即萌生于此。蒙师强调治史的四条要点：广博、精深、贯通、探变。可以说这是先生以自己的治史体验，对学生提出的严格要求。由于治史范围的原因，以后数十年间，同缪师的联系较多。缪钺师强调治学之道，“既要能高瞻远瞩，宏观全局，又要能索隐探微，不可偏执一端。”大学时代的三位业师虽已作古，但其谆谆教导，言犹在耳，巍巍师表，学术品德楷模，言传身教，泽被学子终身。

我的生活经历，说来略有不顺。我和妻子风雨同舟 50 年，她是中学模范教师，教育子女成才，并操持家务，使我能专心治学。但她积劳成疾，因病长期全休，加之我的身体也欠佳，终身都是在同病魔斗争中进行研究工作，尽管这样，丝毫没有动摇我对史学研究的热情和信心。

当我进入历史所后，曾先后熟读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王仲荦、何兹全等前辈学者的著作，这不仅使我清楚六朝历史领域的已有成果，而且从中选定薄弱环节和突破点，同时领会他们的严谨治学精神。1990 年 9 月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去日本讲学，在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同日本多

位著名中国史专家进行文化交流。国外中国史研究成就，日本学者的论著最为重要，吸收他们的成就，更进一步奠定我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基础。

在研究六朝史的 50 多年中，我不仅撰写论文和专著，而且主编八部史著，其中已出版六部，还有《中国历史人物大辞典》（院重点科研项目），我主编魏晋南北朝部分，约 180 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即将出版。《晋书今注》（二十四史今注之一）为古籍重点整理项目，该书注文为《晋书》原文的二倍，约 300 多万字，我与川大及中山大学四位教授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如以一人计为 15 年。因为该书有十志，典章制度及其他难点较多，个别难点向老专家请教也不能诠释者，存疑以待高人。我撰写的《晋书今注·前言》已在《史学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发表。此书将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我在主编各书时，都是亲自作编写大纲、指导思想，以及具体内容，有的我自己参加撰写，而且对每卷作者的章节安排内容进行审定修改，这方面几乎占去我一生研究时间的一半。这样的工作主要在于利用集体力量，同时培养青年学者成长，并发挥退休老专家的余热，从而推进历史研究的发展。其实，主编这些书有的论学术专长的水平我是没资格的，只是出于出版社的约请，以及参加的一部分作者的要求，似却之不恭。

关于学术著作质量方面，曾有多篇对我著作的评价（包括论文集、专著、主编的著作）可以参考。这里我举国



内外两篇书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牟发松指出，“《六朝史论》作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魏晋南北朝研究者的优秀代表，90年代曾任两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如果将《六朝史论》视为这一代研究者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似不为过。”（《书品》1999年第4期，中华书局。）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副校长、教授中村圭尔在述评中说：“本书是一本真正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集，内容非常丰富，其成就兼具有广度和深度而又创新的鲜明特色。兼备独自特色的重要成果，可以把它视为新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又一新的里程碑。”（中村圭尔《朱大渭著〈六朝史论〉摘译》，见《东洋学报》第82卷3号。）另外，复旦大学傅杰先生还将我的《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一文选入《廿世纪中国文史考据优秀文录》。中外学者对我的书评十四篇，大多评价偏高，少有批评意见，使我惶恐不安。我的论著确实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其中有许多不足之处。我想评论者可能含有奖掖之意。我认为时人对学术论著的评价或带有时代局限，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纵观古今学术论著，学人对其学术论著水平多数能形成共识，但也有少数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各代学者对其学术水平高低尚有争论，其实这是学术（包括史学）发展的正常现象，由此而推进各类学科的深化进程。

我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史生涯中，比较重视前辈学者（包括古代和近现代）的教诲和启迪，并总结自己的治史心

得，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深化治史理念和追求，因而也有一些肤浅的认识。首先，学风是各类学术研究领域健康发展带根本性的问题。它是指有关学术领域研究的基本风格和态度。总体说来，其核心要求为刻苦勤奋、诚实严谨、求真创新，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学术成果。显然，学风包含着怎样做人及怎样为文两方面的丰富内涵，这又延伸到学术道德问题。我们提倡坚持优良学风，追求史学真理，而不追求个人名利，做人治学必须力求真诚、求实、创新三者相统一，这应是学风和学术道德要求的最高境界。据此，治史者一定要具有淡泊、宁静、诚实、寂寞的纯真品格以及执著、严谨、求真、创新的奋进精神。前者属于一种思想境界，后者乃是一种实干精神。

当前在史学研究领域，这种风格和精神较为缺乏，因而有“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甚至学术腐败现象发生。这说明科学这块圣洁的殿堂，也受到社会腐败现象的玷污。学界同仁常为此议论忧虑。而反映在学术成果的发表和出版上，各类史学著作虽然数量猛增，但是存在着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以及低水平重复现象，而且剽窃制假等伪劣学术产品，也时有出现，突破了学术道德的基本底限。当前，史学论著真正具有求真创新价值的较少。史学研究队伍的自身建设，研究者对学风和学术道德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有一种高度自觉性和自律精神，显得最为重要。

我国古典史家对学风和史德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唐代

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才、学、识”，即所谓“史才三长”说。元代文坛“四杰”之一的史家揭傒斯任修辽、金、宋三史总裁官时，针对当时学者争正统而互相攻讦，提出了“修史之德”的“心术”主张。他认为修史“以用人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他毅然“以笔削为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辩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清代章学诚继承揭氏主张，在《文史通义》中专列《史德》一篇，明确提出“史德”观点，并作了理论上的界定。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章氏正式提出心术即史家的道德品质，这是指史家从事史学研究的主观意图及动机和目的。史家必须心术纯正，才能具有治史的职业道德。这里“史德”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古典史家主张的秉笔直书，善恶实录，此乃求真务实意识；一是指史家学风严谨，要沉下心来，花深工夫，下大力气，对一切历史事件、制度、人物的阐述评论“律以是非之公”，“以求归于至当”。由此，提出真知灼见，寻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上述优良学风和学术道德精神。

这里，首先应当认识史学自身的特殊性，在史学研究中，无论继承创新或原始创新，都必须有个前提，即真正掌握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以及1000多年来前

人的研究成果资料，一定要穷尽这三类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推雅取正，从而掌握准确可靠的有关资料以及前人的真知灼见。这项基础工作，不要说宋以后，就是先秦至唐末五代，也要花去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有了这个基础工作，才能进一步探索历史社会各领域的真实内容和客观规律。关于揭示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这一步最困难，因为这是真正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我们知道，即便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历史，要精审地解决历史上和文献中的一切疑难之点，也要求对全部有关资料作汰伪存真的清理，作精辟入微的考证，才能求得可靠的结论。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顾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约举有三：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在“博证”中说：“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如果要探索历史规律，当然比单纯考证个别历史事件，更要复杂困难得多。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这里恩格斯所讲的，正是根据历史学科的特征，以理论指导和资料搜集，再经过研究实践而得出正确史学创见的全过程实际上，在历史

研究中考证与论述，微观与宏观二者是紧密结合的。微观研究为宏观研究奠定基础，而宏观研究又可以带动和提升微观研究。初治史者，尤其要重视考证和微观研究因为史学实证性极强，历史研究的正确结论是要在充分掌握和准确解释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再经过理论分析而最后抽象升华出来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毕生没有脱离历史研究，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这一总目的出发，或是用宏观理论分析的方法（又称逻辑思维的方法），或是用实证的方法，或把两者结合运用。马克思在前后共作的7部编年史摘录中，则主要采用的是实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如近年来引起东西方学者热烈讨论的马克思晚年所作的最后一部《历史学笔记》，就是宏观理论分析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典范历史论著。他从具体历史实际出发，其中共引用了8部欧洲及其相关的当时著名历史学论著，对欧洲公元前1世纪到17世纪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论述，并订正或补充了某些被遗漏的重要史实，“通过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论证”，从而为唯物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无论专著和论文，上乘之作总是严谨史实考证、精审理论分析、抽象升华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三者的完美结合。如果不具备实证功底，以及高屋建瓴的理论分析和思辨能力，绝不可能成为一位有成就而杰出的历史学家。还应该注意，治史是研究以往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而以往

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不可能被完全记录下来，即便是不完全记录下来的资料，我们再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它。加之每个人的各种条件有别，因而治史者无论如何勤奋努力，即使其史学论著发挥到极致，除去一些具体历史问题外，其他历史观点都只能是相对真理。因而史学的发展，乃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正如朱熹所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所有上述历史学的特征，决定了要想对中国史研究作出较大贡献，必须穷尽一生精力，长期下苦功夫，拼搏奋斗，方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也就是说，史家毕生都必须在细腻的史实考辨与雄浑的理论分析中纵横驰骋于广阔的历史领域，以求索和升华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之结论。

我国古代著名史家司马迁撰《史记》，先助其父司马谈搜集整理资料，制订体例阶段（前126—前109年），前后共18年。自己发奋撰修（前108—前93年），前后共16年，总共花去34年工夫。这还不算其父为此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心血。实际上，司马迁父子两代人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才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工作。再如，司马光领衔编撰的《资治通鉴》，所参加者刘攽（战国两汉）、刘恕（六朝至隋）、范祖禹（唐迄五代）三人，皆为各段治史名家。他们四人经过19年时间才撰成。如果以一人之力计，则为76年。即使是给正史作较好的校注和集解工作也需要多年甚至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如卢弼《三国志集解》，吴士鉴《晋书斟注》，皆穷尽其一生精力而后成。

由于历史科学的各种特性以及对科学研究的严谨要求，这就决定了治史者必须熄灭学术浮躁之火，摒除急功近利之欲，一生在寂寞、宁静、清贫中度过。这里用得着古人总结的一切事业（特别是学术研究）成功的经验：“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被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方法作出“奇迹”般创见的朱熹曾说：“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揭傒斯说：“惟静为能统天下之至动，惟虚为能容天下之至大……君子学成于静，受益于虚。”总之，澹泊、宁静不是感觉，而是一种思想境界；澹泊、宁静不是心情，而是一种出自内在的理念。当众人在焦急、烦躁、喧嚣中争名夺利，或在灯红酒绿推杯换盏般享受时，我们却应在澹泊、宁静中创造史学之至理。所有这些应是一个治史者必须深刻领会的。这是因为心灵的澹泊宁静，与尘世的名利相争不容，而浮躁急功，又与科学研究的理念相悖，而治史自始至终丝毫离不开宁静与理念。当然，治史也需要激情，但这种激情要沉于心底，形于笔端，蕴于史著。治史者崇高的思想境界，求真务实精神以及对历史科学的执着所产生的爱和激情，以此三项作为理想定力的支撑点，才能真正守住澹泊宁静，为治史而长期过着坐冷板凳的寂寞清贫生活。更要像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那样孜孜不倦 19 年，其《进书表》说：“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臣之精力，尽于此书”那种为治史的牺牲精神。

不管今后研究手段如何现代化，勤奋都是永远必须的。

因为研究手段只能缩短研究过程某些环节的时间，而不能代替创造性思维。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史学研究将越来越难度越大，越需要发挥创造性。而创造性思维则是在科研过程中长期积累和思考的结果。朱熹是我国古代一位对经学、易学、哲学、史学、文学、古文字学等都有极高造诣的学者，可以说其著作的质量和数量都堪称一流。他在《观书有感》一诗中所咏：“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中所感悟的读书治学成功的深刻体验，虽千古之下，学人都能从中领悟到治学的一切创新识见，都是在心窗八面思绪恢宏的艰苦卓绝地勤奋学习中，才能像清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

中华民族有着特别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其核心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等地上和地下历史文献和文物载体，历代相传，从未间断，因而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它乃是历代史家、文士和各族人民用泪和血创造和谱写而成的。我们作为这种伟大历史文明传承总结工作的一员，肩负着艰巨而神圣的使命，当然，这也是一种光荣的任务。这种职责对我们提出了严格要求。当今社会充满利润竞争，人间物欲横流，诱惑殊多，治史者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以及求真务实精神。史学创新，特别是第一流的创新，不仅需要才、识、学，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一个有素养的史家，其专业上的素质以及全面的文化学术修养，乃是长期刻苦勤奋而获得的，乃是经过千锤百



炼，不断升华，具有较高的自律原则，从而成为一个有优良学风和道德风范的学人。一个明智史家的人生哲理，就是不断奋发地追求历史客观规律，勇于史学创新。人类社会就是在追求真理中，不断地创新，以推进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可以说，这是史家对史学深邃入骨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一种唯一选择。

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永远值得我们去热爱，它是我们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的源泉，它蕴涵着永远探索不尽的社会历史发展真谛。我们凭借此种优势，必须用实际行动撰写出高质量的史学论著，以适应改革开放时代，激发祖国人民自觉地认识和创造历史，自强不息地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不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人类历史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借此机会略述平生对治史的追求和理念，主要针对当前史学界实际情况有感而发，其用意或能与同仁共勉。更重要的乃是寄希望于青年史学工作者，因为历史科学的传承和发展，必须由青年学者肩负起来。青年学者欣逢盛世，当前国家为学术（包括史学）的大发展大繁荣采取了各种措施，只要青年学者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勤奋拼搏，其成就必定能够超越我们，其中有的可能成为一代史学大师。这是我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想法，请千万不要辜负时代和人民对你们的殷切希望。